



培羅蒙先生

戴祖貽

李璵
著

上海大学出版社

“培罗蒙先生”戴祖贻

李 城 著

上海大学出版社

·上海·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培罗蒙先生”戴祖贻 / 李璵著. —上海: 上海
大学出版社, 2017.8

ISBN 978-7-5671-2888-0

I. ① 培… II. ① 李… III. ① 戴祖贻—生平事迹
IV. ① K825.38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7) 第 177537 号

责任编辑 焦贵萍
美术编辑 缪炎栩
技术编辑 金鑫 章斐

“培罗蒙先生”戴祖贻

李璵 著

上海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

(上海市上大路99号 邮政编码200444)

(<http://www.press.shu.edu.cn> 发行热线021-66135112)

出版人: 戴骏豪

*

南京展望文化发展有限公司排版

上海市印刷四厂印刷 各地新华书店经销

开本 787mm × 1092mm 1/16 印张 14.5 字数 227千字

2017年8月第1版 2017年8月第1次印刷

ISBN 978-7-5671-2888-0/K · 167 定价: 56.00元

目 录

一、“一路看山”	1
二、苦难童年	5
三、拜师学业	8
四、立足城区	13
五、学徒三年	17
六、学成回乡	22
七、业中名店	24
八、善用广告	30
九、名扬沪上	34
十、南迁香港	39
十一、创业东瀛	51
十二、独立门户	66
十三、“艺术大师”	75
十四、生意要诀	86
十五、伉俪情深	94
十六、殷殷乡情	104
十七、幸福晚年	119
十八、一世情缘	129
附录一	135
记忆中的三星集团李秉喆会长 / 戴祖贻口述 李瑛记录整理	135
美国大财阀印象记 / 戴祖贻口述 李瑛记录整理	140
我与“棒球大王”王贞治的交往 / 戴祖贻口述 李瑛记录整理	143
我与许达昌的师徒情谊 / 戴祖贻口述 李瑛记录整理	147
我所了解的顾天云先生 / 戴祖贻口述 李瑛记录整理	153
我家的人和事 / 戴祖贻 李瑛	155

我的祖辈·····	155
我的父亲母亲·····	156
我的兄弟姐妹·····	161
我的妻子·····	164
故乡二三事·····	166
在90寿辰典礼上的讲话 / 戴祖贻·····	167
附录二·····	170
MR.SOI TAI BUILDING AND UPHOLDING THE BAROMON TRADITION AND REPUTATION OF FINE CHINESE TAILORING/S. R. Ovshinsky ·····	170
附录三·····	173
上海各弟妹祝贺培罗蒙60周年创业纪念 / 戴氏亲族·····	173
我对祖贻哥的崇敬心情 / 戴源鑫 ·····	174
谈谈我姐夫戴祖贻的成功之道 / 张泓 ·····	178
“培罗蒙是我的生命” / 李瑛 ·····	179
附录四·····	190
戴祖贻年表·····	190
附录五·····	190
“Mr. Baromon:” A life story of Mr. Dai Zuyi ·····	198
附录六·····	218
穿西装之门径 ·····	218
公私合营培罗蒙西服店情况简介 ·····	220
后 记 / 李瑛 ·····	223

一、“一路看山”

三面波光拥一城，江潮时共海潮生；
人家住在潮声里，半是风声半雨声。

——〔清〕胡·《蛟川竹枝词》

北仑，地处甬江口南侧，区内有中国“港口皇冠”之称的北仑港。这里三面靠海，境内平原广阔，河网交叉，山海延绵，有“四山一地一分水”之称。行政区划几经变更，原属宁波镇海县治，1987年定名为北仑区。^①

距北仑港不远的地方有个霞浦镇，东连柴桥镇，西接新碇镇，北倚金塘港，与舟山群岛隔海相望，距穿山半岛3千米。霞浦，在很久以前是绵延的海涂，随着岁月的流逝，斗转星移，沧海桑田，这里开始成为涨涂，又从涨涂变为陆地，霞浦的“浦”就是指水边或河流入海的地方，作为地名在清朝初年就已出现。相传原有上浦（今称上傳）、下浦之称。此地的居民有很多人都姓张，因此这里俗称“下浦张”。

霞浦南面有个戴家村。据老一辈人说，清朝初年，鄞县天童有几位姓戴的农民迁居至此，在这里辛勤劳作，生息繁衍，遂集聚成村。因此早些年时，每逢清明，还经常有戴家村人去天童扫墓祭祖。

戴家村又称戴家岙，亦名穿山戴家。戴家村依山傍水，背倚康家山、老鼠山，面临洪溪庙后山，侧傍扶驾岭，三面有丘陵环护。这里是海濡之地，土瘠民贫，是个四方有名的穷山坳，只有30多家住户，有些人家甚至没有大门和围墙，真是

① 北仑，辖区陆域面积585平方千米。隶属镇海县。1984年1月建滨海区，1985年7月以甬江为界，北为镇海区，南为滨海区。1987年6月滨海区更名北仑区。北仑区以境内的深水良港——北仑港而得名，北仑港则是以港中小岛北仑岛而命名。



镇海海边

“开门见山”。有词曰：

高河塘外秋风吹，长山桥头秋日迟；
一路看山到霞浦，恰逢九月望潮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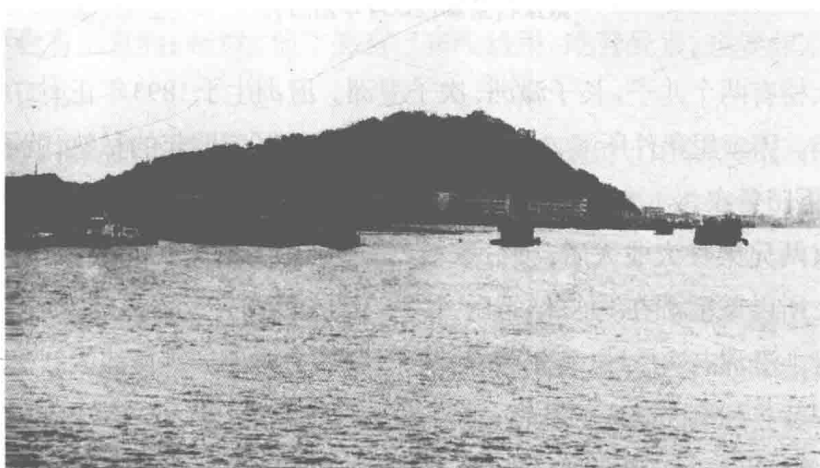
镇海地区环海而邑，这里的民俗勤朴，居山者，以耕凿为生，濒海者，以渔盐为业。嘉靖《宁波府志》载曰：镇海“滨海斥卤，其土瘠。其俗甘勤苦，务织作，温柔敬爱，有古遗风。”另据民国《镇海县志》记载：镇海县“滨大海，居斥卤之中，其土瘠而无灌溉之源，故耕者无终岁之给”；^①这也是戴家村的写照。在戴家村生活的数十家农户，其主要的谋生之业，就是为富户人家开垦土田和山林。到了岁寒农闲时节，乡民们还要播草籽，捻河泥。村里的小河流直通柴桥的一条大河——芦江河。乡民们两三人一组，摇着农船，从村河到芦江河，再到柴桥、穿山的河浜中挖河泥，因为那里的河泥黑糊黏稠，肥力十足，可以作为第二年早稻、晚青稻的基肥。

戴家村人还有一个主要的活计，就是卖菜秧。到了春夏的芒种、夏至时节，家家户户起早落夜，培育菜秧。待到秧苗长成的时候，乡民们头一天夜里就要

^① 民国《镇海县志》卷四十一，风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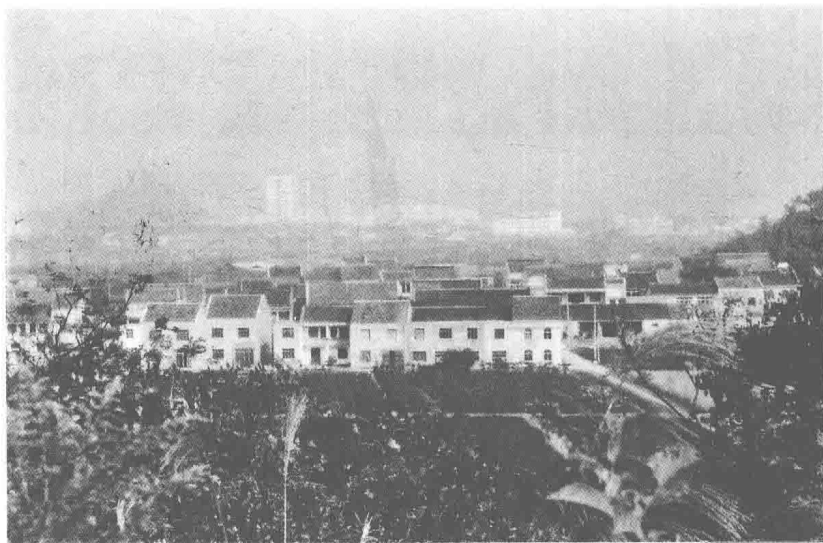
甬江入海口。



镇海口招宝山。

把菜秧拔出来，小心翼翼地捆扎起来，一般50株一捆，整整齐齐地摆放在大竹篮中。第二天天不亮，大家就提着灯笼，成群结队地将菜秧挑到高塘、柴桥，甚至远至梅墟等地，摆摊出售。这里的人们虽然生活困苦，但勤劳质朴，民风醇厚。

戴家村分为东舍、西舍、中舍三片地区。东舍弄边有一位木匠，名叫戴大榜，从小学就了一些雕刻的手艺，替祠堂庙宇和有钱人家做工出力。戴大榜辛苦劳累了一辈子，也没攒下值钱的家当，能够留给儿子的家产只有两间将要倾塌的破旧房子。



戴家村全景(2004年前后)。

戴大榜有两个儿子，长子瀛洲，次子澄洲。澄洲生于1893年正月二十四日，书名望熊。因家里条件所限，体质孱弱的澄洲只读了三四年的私塾，就不得不放下书包，下田务农。

戴家两兄弟长大成人后，便分家析产，澄洲分得的是一间根本没法住人的旧屋子。所以戴澄洲在19岁结婚后，因为无处居住，一家人只能在霞浦岳母家附近安身。澄洲老实憨厚，终年劳作，从不停歇，有时还要到霞浦卖红酿豆腐，这是一种用黄豆和臭卤做成的乳腐；下午则上山砍柴，只要天气晴好，不要刮风下雨，每日总可以挑回一担柴火，除了自己家用外，多余的还可以卖掉，换些零星小钱，买点油盐酱醋。

1921年6月1日(农历四月二十五)，一个眉清目秀的男婴在戴家村的旧屋里出生了，他就是澄洲的长子。添丁的欣喜给戴家增加了不少喜气，冲淡了穷困生活所带来的愁苦和郁闷。祖父戴大榜亲自到宁波，请测字先生测算一番，为小孙儿取名叫戴祖贤(后来改为戴祖贻)，书名源馨。

二、苦难童年

转眼间，祖貽已经到了上学年龄。

几年来家里的境况并没有多大改变，仍然还是穷得叮当响。父亲体弱多病，偶尔还要去镇上帮工，或外出砍柴，母亲也曾一度外出帮佣。但有一点，父亲澄洲心里非常清楚，不论日子如何艰辛，一定要让孩子识文断字，要有文化有知识，否则是不会有出息的；所以，他宁愿自己省吃俭用，吃苦受累，也要想方设法让儿子求学读书。

7岁时，祖貽进入霞浦张菊卿先生的私塾学习，这时，父亲澄洲已在镇海小港一家杂粮店工作，老板姓李，属于小港李氏家族。提起“小港李家”，那可是沪甬两地赫赫有名的金融工商世家大族。

不到一年，私塾被并入霞浦小学。霞浦小学是当地一所著名的新式学校，教授国语、算术、体育、图画等课程，从这里走出了上海明星影片公司的创办者张石川等著名人物。

在霞浦小学上学时，小祖貽虽然少年天性，少不了顽皮贪玩，但毕竟是一个很懂事的孩子，他深知家境贫穷，于是倍加珍惜这个来之不易的学习机会。为了减轻家里的负担，祖貽小小年纪就经常帮助大人做些力所能及的家务。10岁那年，邻村杨家建造新屋，要用砖石砌墙基。祖貽得知这一消息后，只要有一点空闲时间，他就在村子周围和河边路旁捡拾一些小砖块，挑到杨家，过秤计量，以获得一点酬劳，贴补家用。夏天，祖貽还经常与同村人结伴，一起到池塘里捕鱼捉虾，回来交给父母烹饪尝鲜；有时他也跟着父亲到山上砍柴，帮父亲分挑沉重的柴担。

旧时代，穷人家照明用的是菜油灯。点燃油灯用的火柴，又称洋火，乡下穷人家是买不起的，戴家也是如此，所以在点灯时，就改用一种特别的很薄的纸来



戴祖贻学成出师后，自己出资修建的戴家故居，左面第一间是其1940年满师后回家所住之处，现已拆除。

引火，人称“媒头纸”。祖贻看到，大人们为了节省，用“媒头纸”将灯点着后，马上用嘴将其吹灭，以留待下次再用。

家贫万事难，家里一贫如洗，有时甚至连上厕所用的草纸也没钱买。当时乡间小杂货店里售卖的白糖都有一层外包装纸，穷极思变的乡里人家把外面这层纸当草纸使用，机灵聪敏的小祖贻心想：在一斤店里买一斤白糖只能得到一张包装纸，如果在三家店里买，岂不是可以得到三张纸了吗？为了多得几张这样的“草纸”，每当妈妈吩咐他去买白糖的时候，他便干脆连跑三家杂货店，如此这般，乐此不疲。

“穷人的孩子早当家”，家里整天靠借钱过日子，更没有钱给小祖贻买一双像样的鞋子，祖贻平时穿的都是妈妈千针万线亲手纳成的布鞋。就这样，他穿着“妈妈牌”布鞋，踏着崎岖的石子路，天天来往于学校和家里。碰到下雨天，祖贻舍不得把仅有的一双布鞋弄湿，干脆就不穿鞋，光着脚走在雨水里；如果去亲戚家做客，也是先穿着草鞋去，快到亲戚家时，再找个僻静的地方，下河把脚洗洗干净，然后再穿上干净的布鞋布袜。有一次，父亲为祖贻买了一双有鞋带的运动鞋，小祖贻如获至宝，兴高采烈，他后来回忆道：当时的心情就像是得到了一辆非常难得的玩具小汽车一样，心里别提有多高兴了。



重修后的戴家老祖堂复兴堂(1991年10月)。

正当祖貽在小学读书时，父亲不幸失业，家中的境况更是雪上加霜。有一天，学校通知大家：凡是今日尚未付清学费的学生，明日就不能来学校上学了。祖貽回到家里，眼泪汪汪地把这个消息告诉了父亲。父亲澄洲听了，也为难地说：家里实在困难，没法再供你上学，学校既然这样说，那你就不要再去读书了吧。听罢此言，祖貽心里难受极了，忍不住涕泪俱下。母亲只好去亲友家四处借钱，东拼西凑，最后终于付清了学费，祖貽总算没有中途辍学。6年后，祖貽如愿以偿，得以小学毕业，掌握了基本的知文识数的技能。

小学毕业后的祖貽在家闲着没事，便又在学校读了半年的补习班，这里教授学生一些简单的古文诗句，还教他们诵读《古文观止》等。

宁波与上海一苇可航，宁波人有到毗邻的上海谋生经商的习惯，许多男孩子10多岁就去上海“学生意”，虽然前途未卜，也聊胜于在家中挨饿受冻。为了能够早日赚钱养家，改变家里捉襟见肘的困窘境况，祖貽小学毕业后，母亲拜托舅父带他到上海学生意。

三、拜师学业

1934年6月17日，13岁的小祖貽由舅父、舅母带领，由霞浦的家中出发，从穿山乘轮船到上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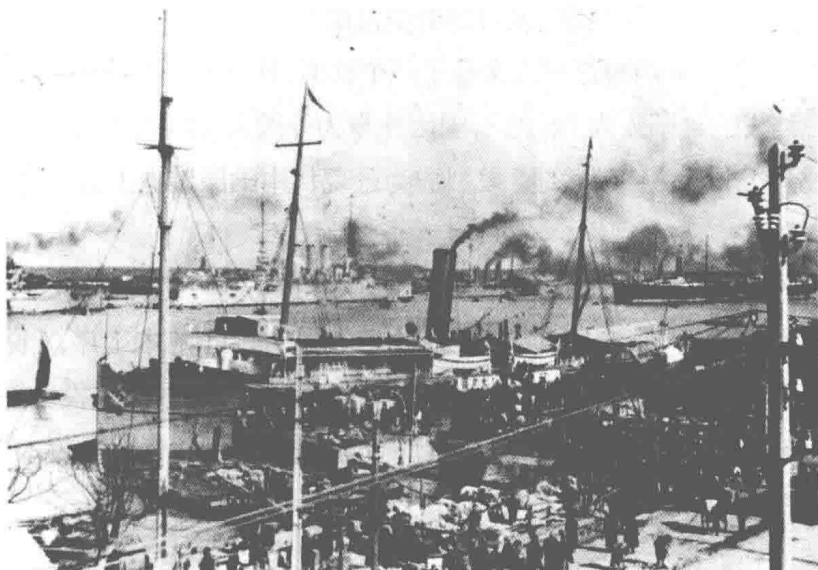
望着缓缓远去的家乡山水，祖貽此时此刻的心情，真是悲喜交集。使他感到悲愁的是，此番一去，不知何时再能见到生他养他的父母，离家时，母亲刚刚生下小弟祖才，妈妈站立在门边，目送他远去的情景，依然历历在目；高兴的是自己可以到上海去了，他经常听爸爸讲起上海的繁华和神奇，如今自己马上就要去往这个既陌生又神秘的城市，以后还不知道会怎么样呢……

祖貽躺在轮船顶端的通铺上，这里到处弥漫着浓重的柴油味，耳边伴随着一阵阵有节奏的机器轰鸣声，更使得祖貽心潮起伏，思绪万千，久久不能入睡。

经过一夜的劈风斩浪，轮船终于在第二天一大早停靠在上海十六铺码头。

十六铺码头地近南市城隍庙，是上海的水上门户之一，历史文献这样记载：“凡远近贸迁皆由吴淞口进泊黄浦”。每天有无数来自天南地北的人们从这里进出沪埠，所以十六铺码头也是上海最热闹的场所。祖貽一行出了码头，映入眼帘的是一派车水马龙、熙熙攘攘的热闹景象。只见马路上的汽车驰骋穿梭，川流不息，街道上随处都是身着各色打扮，讲着各种方言的人们，还有从未见过的红头发、蓝眼睛的外国人。人声鼎沸，热闹非凡，一切的一切，让初来乍到的祖貽眼花缭乱，啧啧称奇。

正当祖貽东张西望之际，放在身边的一只手提箱却不翼而飞了。这只木制的小提箱是父亲年轻时曾经用过的，箱子里虽然没有什么特别值钱的东西，但那里面的可是祖貽的全部家当：一元几角现金，一套白条子的府绸布衫裤，这是自己唯一一套像样的衣服；还有一包黄豆拌泥土，这也是宁波人出门的习惯，意



上海的门户——十六铺码头。

思是初到他乡，要用家乡的泥土克服异地的水土不服，以便早日安居；另有几个软包糕饼，是亲友送给他的路食。如今刚到上海，箱子就被偷了，这让祖貽感到非常沮丧和郁闷。好在还有家里带来的被子铺盖，被子是母亲的嫁妆，包铺盖用的篷帆布也是父亲曾经用过的物品。看着这些东西，总算还能聊以慰藉祖貽的思乡之情。

祖貽跟着舅父来到淡水路秀云里的家，当晚就住在舅父家的公用客堂间里。第二天早上，他跟随舅父来到四川路新丰呢绒号，这是舅父工作的地方。祖貽怀着激动好奇又忐忑不安的心情，在这里又盘桓了几天。

1934年6月24日，戴祖貽正式进入培罗蒙西服店，拜店主许达昌为师，成为店里的第一个学徒。

西服业是上海开埠后渐趋兴旺的一个新兴行业。鸦片战争后，上海辟为通商口岸，对外贸易日渐繁盛，到这里从事商贸的洋人纷至沓来，西装洋服渐成时髦。当时进出上海港口的外国船只不能直接靠岸，只能集中停泊在黄浦江中，有的船只最长要停一两个星期，于是一些裁缝就到洋船上为外国人缝补西服，人称“落河师傅”。这些“落河师傅”如需登船，需由船主派发通行证。不同国别的兵舰有不同的“落河师傅”。在缝补西装的过程中，这些“落河师傅”逐渐

学会了西装洋服的缝制技术,以后便很少再做长袍、对襟衣等中式衣服,而是专门制作西服,于是业内对这群人又有了一个称谓,称其为“番帮师傅”,因为中国人称高鼻红发的外国人为“红毛”,^①因此专为外国人缝制衣服的手工业者亦称“红帮裁缝”。以后“红帮裁缝”发展成为近现代中国服装史上最具特点的群体之一。

中国民间称缝制衣服的人为“裁缝”或“缝衣匠”、“成衣匠”,古代亦称“缝人”“缝子”“缝工”“成衣人”等。裁、缝是制作衣裳的基本工序,《说文》曰:“裁,制衣也。”《周礼·天官》亦载:“缝人,掌王宫之缝线之事,以役女御,以缝王及后之衣服。”清代《土风录》卷六也有记载:“成衣人曰裁缝……盖本为裁剪缝缀之事,后遂以名其人。”

宁波人在近代上海成衣业,以及后来的西服业中占据着举足轻重的地位。因为成衣业是甬人特别擅长的行业,早在清朝初年,慈溪县成衣行手工业者就在北京设立了浙慈会馆。上海开埠后,“洋广衣业”渐趋发展,来自宁波及所属鄞县、奉化、定海、慈溪、镇海、象山六邑的裁缝是“洋帮裁缝”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六邑宁帮”(或称“宁帮洋广衣业”、“宁帮裁缝”)也因此成为上海西服制作业中的主要帮派。咸丰五年(1855年),“宁帮裁缝”建立了行会组织,即“北



《鄞县志》中有关“红帮裁缝”的记载。

① “红毛”最初指荷兰人,后来才泛指所有西洋人。



上海王顺昌西服店。

长生”关帝圣王殿。《鄞县通志》中也说：“自海通以还，工人知墨守旧习不足与人相竞争，于是舍旧谋新，渐趋欧化。若成衣，若土木，若铜铁，若机械，若绘图（俗曰打样）等，东南两乡业此者孔多。成衣、土木名之曰红帮裁缝、红帮作头。”

由此可见，“宁帮裁缝”即甬籍裁缝的发展趋向与“红帮裁缝”的演变同源同流。因此，关于“红帮裁缝”名称的来历，还有一种说法，是与宁波人有关的。因宁波奉化籍裁缝人数众多，技艺高超，实力不可小觑，其开设的西服店在“宁帮洋广衣业”，同时也在上海西服业界具有显著的影响和重要的地位。为了与“宁帮衣业”中的其他帮派相区别，他们自称或被人称为“奉帮裁缝”；同时，原来以上海籍裁缝为主的“洋广衣业”称“本帮”，一般被视为是专制中式服装的裁缝。而在宁波方言中，“奉”与“红”基本同音，于是“奉帮”即被称作“红帮”，“奉帮裁缝”超越了“奉化”的地域范围，成为所有西服制作者的统称。

上海开埠初期，很多“红帮裁缝”还没有自己独立经营的店面，只是随身携带包裹，四处兜揽生意。他们以国外传入的服装图册作为样本，拎着一个小包



袱，里面装着裁剪缝纫的所有家当，专门到外国轮船上兜揽加工洋服的生意，所以人们形象地称之为“拎包裁缝”。这些裁缝师傅大都招收一二个学徒作为助手，自己承担着主要的活计。

日后鼎鼎大名的培罗蒙在当时还不是非常出名的店铺，店主许达昌是定海人，1895年二月初一出生。他曾在家乡读过几年小学，来上海后，在王顺昌西服店当学徒。王顺昌也是上海西服名店。刘呐鸥^①是20年代上海著名作家，他平日是很讲究衣着的，经常光顾西服店定制衣服，他曾在一天的日记中提及：“去王顺昌做TUXEDO（夜礼服）。”

在王顺昌西服店，许达昌从一个小徒弟做起，主要由师兄阿木哥（音）教他学习裁缝技术。学成满师后，许达昌自己在南市老西门开设了一个工场。开始时他只能做“包袱生意”，就是拎着包袱到处兜揽生意。

约1930年前后，许达昌先在四川北路开店，后又在南京路新世界开了一爿店，挂的招牌都是“许达昌西服店”。^②

1932—1933年，许达昌与湖州丝商蔡履新合伙在静安寺路（现南京西路）735号重新开办了一家西装店，正式挂出了“培罗蒙”的招牌。

① 刘呐鸥（1900年～1939年）原名刘灿波，笔名洛生等。台湾台南人。从小生长在日本，入东京青山学院读书，后毕业于庆应大学文科。精通日语、英语。回国后，又在上海震旦大学法文特别班攻读法文。20年代末倾向进步，于1928年创办第一线书店，被查封后，又经营水沫书店。出版过《马克思主义文艺论丛》（后改名《科学的艺术论丛书》）等书刊，创办《无轨列车》半月刊，发表文学作品。1929年，与施蛰存、戴望舒等在上海合编《新文艺》月刊。

② 还有一种说法，据《黄浦区服装志》第123页记载，许达昌于1928年在四川中路开设许达昌西服店，1932年搬到南京路新世界楼上，1934年又迁到新华电影院对面（现上海照相馆隔壁），取名为培罗蒙西服公司。一年后迁至南京西路284号。